「中國製造」·「中國設計」

陳 安

藝苑草

有如中國人會對美國有所批評、甚至挑剔一樣，美國人也會對中國有所批評、甚至挑剔。面對他們的批評或挑剔，我們應該冷靜，想一下他們的話是否眞有道理，而從那些言之有理的話中，我們應該體會其態度的眞誠，以及吸取其忠告的必要。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訪華後寫的文章，有對中國的熱情稱讚，更有對中國的批評和建議，筆者覺得他是一個眞正希望中國好的美國人，他的很多觀點和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弗里德曼關注環境保護問題，每年訪華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中國人說話更自由了，呼吸則更困難了。他眼見中國環境污染現象嚴重，衷心希望中國不要重蹈美國的覆轍，不再嘗美國人嘗過的「先發展，後清潔」的苦果。他說他讚賞鄧小平關於「白貓和黑貓」的話，並希望中國還有一隻「綠貓」，有一個空氣新鮮、河水清潔的綠色環境。

不久前，弗里德曼再訪中國，看到珠海國華匯達風能開發公司建造的風力發電站已開始發電，從而使廣東省進入了開發和使用綠色能源的新時代，便寫了一篇文章，欣喜地報道說：「中國正在走向綠色」。

然而，他又說，這既是一則好消息，又是一則壞消息，因爲他在風力發電站所在的山上看到了澳門。在這個賭城，其中一家酒店就有八百七十張賭桌、三千四百台吃角子機器，而風力發電站二十一台發電機所發的電只能供這家旅館賭徒大軍的「綠色賭博」用上幾個小時。顯然，這個來自擁有合法賭城及其無數賭桌和吃角子老虎的美國的專欄作家，對賭博也是十分反感的。

從珠海風力發電站的建成，弗里德曼想到了中國應逐漸發展一種更爲清潔、以知識爲基礎的服務性經濟。他說，這種經濟應從「中國製造」變爲「中國設計」和「中國創想」，也即中國經濟應變得「更綠」、「更聰明」。爲此，中國公民應有監督地方企業和政府、對其污染環境行爲提出訴訟的權利，中國還應有更自由的信息流通，從而有一個基於知識深化的改革創新的社會。

弗里德曼顯然不是那種害怕中國崛起、認爲中國的強大會構成對世界的威脅的美國人。他的建議好得很。是的，中國不能僅有廉價的勞動力，不能只有製造產品的工廠作坊，而應該像古文明時代一樣，像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所展現的那些遙遠年代的壯觀瑰麗景像一樣，有更多的構想和發現，有更多的設計和創造，有更多、更重要的「四大發明」，從而成爲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的當代文明大國。

黑嬰的《紅白旗下》

許定銘

醉書亭

韓萌所編的《赤道文藝叢書》：黑嬰的《紅白旗下》，米軍的《熱帶詩抄》、蕭村的《椰子園裡》、韓萌的《紅毛樓故事》、《海外》……雖然全是南洋作家的創作，但在香港編印，坊間也常見，很可能比南洋還容易找到。此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黑嬰的《紅白旗下》（香港赤道出版社，一九五〇）。

黑嬰（一九一五至一九九二）原名張炳文，是出生於印尼的廣東梅縣人，一九三二年入暨南大學外語系，並開始創作，曾加入葉紫的「無名文學社」，建國前曾出過《異鄉與故國》（上海千秋出版社，一九三四）、《帝國的女兒》（上海開華書局，一九三四）、《雪》（上海千秋出版社，一九三六）和《時代的動感》（雅加達鮫人書屋，一九四九）等多部創作。

《紅白旗下》是約七萬字的中篇，一九五〇年六月完成於椰卡達（今譯雅加達）。「紅白」是印尼國旗的顏色，是代表鬥爭的旗幟，但《紅白旗下》寫的不是歷史，而是以小說的形式，寫華僑的生活。黑嬰在《後記》中說：

我所着重表現的，並非印尼人民，而是華僑的進步與倒退的鬥爭。還觸及倒退陣營內的種種死硬相，也不惜給一些華僑民主人士（不是全體）下一番針灸。（頁一二二）

《紅白旗下》出版後甚受歡迎，同年已印兩版。

春之布拉格

方 元

如是我見

八月底去捷克，涼爽的秋風中仍然能感覺到「布拉格之春」的餘熱。「瓦茨拉夫廣場」是布拉格的市中心，也是這座城市的歷史博物館。僅僅在最近的半個世紀中，它就見證了捷克的兩次歷史巨變。在高大的瓦茨拉夫親王的銅像下面，有一座小小的、低調的、很容易被忽略的墓碑，但卻沒有人忽略它。那裡埋葬着兩個同名的青年——十九歲的伊安和二十歲的伊安。他們雖然互不相識，但四十年前他們同在這個廣場，爲了同一信念，把自己青春的身體當作火炬點燃。

今年八月是「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一九六八年，捷克人追求「人性化的社會主義」，但俄國「老大哥」的坦克把他們的人性和尊嚴碾壓得粉碎。如今，在「瓦茨拉夫廣場」看到的不再是蘇聯士兵和滿腔怒火的青年學生，而是美國遊客和滿身惹火的賭場女郎。「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早已不存在了，但「里根式」的資本主義爲捷克人帶來了他們想要的人性和尊嚴嗎？

在「瓦茨拉夫廣場」的國家博物館前，正在舉辦一個內容膚淺、名爲《布拉格一九八六》的歷史圖片展覽。一輛當年蘇軍使用的坦克車擺放在博物館外面，並且模擬發出隆隆的聲響。西方傳媒希望在布拉格找到四十年前的憤怒，但令他們失望的是，那些經歷過「布拉格之春」，現已染上秋霜的人寧願選擇沉默，而沒有那場經歷的青年人對那段歷史並不了解。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造反」的年代。無論在布拉格，還是在巴黎、加州、香港、北京，都會看到激昂的青年人衝上大街，反對「當權派」，要求改變社會現狀。然而無論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這些青年人的運動都同樣遭到了否定。滿腔的激情卻換來挫敗的人生，歷史給他們留下了巨大陰影和深深的創傷，並在他們的理想與社會的現實之間築起了一條代溝，使他們難以把自己的過去和反思告訴下一代人。

今天的青年人以爲現在的捷克就是一九六八年那一代青年想要的那個捷克。實際上，那些「六八代」的人並不完全認同今天的狀況。在他們的眼中，一九八九年的「天鵝絨革命」並不是「布拉格之春」的延續，它只是借用了過去的名義、形式和地點，而並非他們當年爲之奮鬥的目標。

事實上，一九六八年歐洲有兩個「之春」，一個發生在布拉格，另一個則發生在巴黎。前者要求改革社會主義，後者則奮力反抗資本主義。今天，當法國的「新左派」正重新給馬克思主義注入活力的時候，捷克的前共產黨人則在努力沖洗馬克思主義的痕蹟；當法國人對布爾喬亞文化感到厭惡的時候，捷克人反要追回失去的布爾喬亞生活；當法國人反對全球化的時候，捷克人卻委身加入了「共同市場」，還把布拉格國際機場交給法國航空公司管理。世上的事就是這麼諷刺！

近年，布拉格取代巴黎成爲歐洲最有吸引力的旅遊城市，成爲西方遊客的「新迪士尼樂園」。除了沒有「米老鼠」之外，它具有許多迪士尼的元素，例如古城堡、哥特尖塔、小鎮大街，以及成群結隊的美國遊客。在最繁華的布利克培大街，「共產主義博物館」與「麥當勞」在同一座大樓裡營業，而且它們都以紅色作爲主色，讓人難以區分。

在「天鵝絨革命」二十年之後，在加入西方全球化經濟體系以及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後，捷克人開始重新探討四十年前「布拉格之春」提出的問題：在東方與西方文化之間，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條和諧的中間道路？這個問題對於捷克，以至對於歐洲和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仍然具有普遍的意義。

閩南台灣床文化奇觀

展 華

文化什錦

有人說，人生在世，床是必不可少的傢具。這話不無道理，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就是在床上度過的。床，猶如人生之舟，由此地到彼岸，從起點到終點，生生死死都離不開它。在地緣近、血緣親、俗緣同的閩南和台灣，人們對床的感情在全國可謂獨一無二。床既是生活中的傢具，也是民俗中的道具，演化出不少獨具情趣的禮儀和婚俗交融的床文化奇觀。

閩南和台灣人習稱床爲「眠床」，爲何要加個「眠」字？原來，台灣個別地區沿襲祖籍地粵東一帶的習慣，稱飯桌爲「床」，如不加個「眠」字以示區別飯桌和睡床，豈不鬧出一些笑話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今，閩南和台灣人都很看重婚床，結婚的花費有相當部分就是花在床上的。傳統婚禮很看重仿古婚床，通常做床的木料選用優質的杉木、樟木、楠木等，由能工巧匠精雕細鏤而成，是一件古色古香的藝術品。最近，筆者閱讀閩南籍台灣著名學者林再復寫的《閩南人》一書，書中對古式眠床有這樣一段描繪：「客廳兩旁的房間爲卧室，床前橫一踏腳的長方櫈，俗稱腳椅，作爲脫履登床之用。卧床和內地無異，但豪奢人家的床都很精緻，三面圍屏，雕刻人物、山水、花鳥。床的正面一如客廳，置長方形帖案。」由此看來，這婚床就是洞房中之「洞房」了。婚床之豪華舒適除了枕頭、被毯等之外，人們尤其注重婚床與蚊帳鈎的配搭。一對精美的鑲銀嵌玉的帳鈎，其價格有多高可想而知。上世紀八十年代，福建東山島有位叫鄭蓮的民間老藝人曾用數百顆瑪瑙、珍珠、鑽石，根據不同的顏色、形狀精心雕鏤編綴成一對含有千姿百態的珍禽瑞獸、花鳥蟲魚的金銀帳鈎，參加過「廣交會」展銷，令人歎爲觀止！姑娘出閨最講究和最被看重的陪嫁品之一，也是一對鑲金嵌玉的精美帳鈎。新婚之日，人們入洞房看新娘的同時，其實也在欣賞婚床和帳鈎的做工和質料如何。筆者在北京故宮參觀過古代「萬歲爺」的寢室，裡面擺設的「龍床」與我描述的台灣和閩南的古式婚床竟沒有什麼差別。由此可見，台灣和閩南的古式婚床有多豪奢了。

結婚是人生一大要事，而婚床則是要事中的重點傢具，因而人們對婚床的安放不僅講究而且慎重。首先要選擇良辰吉日進行安床，安床的方位有嚴格規定，其位置要按男女雙方的生辰八字、窗向、神位來確定，忌與桌、櫃、櫥相對。對於屋頂有棟樑的，床的擺放要與棟樑平行，如果豎放謂之「挑樑」，被視爲不吉利。床板必須成雙數，一般爲八塊或十塊，寓意好事成雙。新婚眠床不能由新郎自己動手來鋪，必須請來宗親中的「福人」（幸福家庭的長輩）來操持。鋪床時，席下四個角落或四支床腳要墊放幾枚古銅錢或硬幣，寓意「財丁兩旺」。操作過程中要說吉語，通用的安床吉語很有趣味，內容很中聽：「洞房花燭通通紅，才郎淑女配成雙。祝賀明年得貴子，光宗耀祖把代傳。」從安床的風俗看來，床的擺放大有科學可言。如：床頭不宜在窗下，這是因爲床頭在窗下，人睡眠時有不安全感，如遇大風、雷雨天氣，這種感覺更是強烈。如果家中有好動兒童，容易借床爬窗，其後果不堪設想。床的擺放對着梳妝鏡也是禁忌，這主要是人夜間起來時，特別是睡眠中朦朧醒來時，在光線較暗的地方，看到鏡中人在活動，容易受驚嚇。安床忌高低不平，忌床面太軟，脊柱長期彎曲會影響血液循環，使人疲勞容易生病，所以平穩的床和軟硬適中的床才是理想之選。

在閩南和台灣民間，有關婚床的趣俗不少，如安床後到新婚前夜這段時間，新郎都要睡新床，俗諺云：「睡空鋪，不死夫，也死妻」。同時，必須由弟弟或未婚男人陪睡，以取成雙作對的吉兆。新娘出嫁時，娘家要讓她帶上公雞和母雞一對，進洞房後，由男方的姑嫂放入床底下，親友賀客圍觀着看哪隻雞先走出床底，若是公雞先出來，人們會喝彩：「頭胎生查埔（男）！」要是母雞先露面，同樣也有歡笑聲：「先生阿姐招小弟！」此情此景不啻於在觀賞一個精彩節目！新婚之夜，新郎家要選一個男童上婚床翻滾，這一婚禮謂之「翻床鋪」。事先大人要教會男童說幾句吉語，如「翻床鋪，生查埔（男）。翻過來，中秀才。翻過去，都如意」。平常放在同一房間裡的兩張床，也有上下首之分。有客留宿，按照禮儀輕重，應該請客人睡在上首那張眠床。如果主人讓客人睡在下首的床，便含有輕慢之意。床是人生之搖籃，人們敬之有加。每逢春節、七夕等傳統節日，閩南和台灣人都要辦供品，擺到床前敬奉「床公床婆」。人們俗信床有床神，祭祀床神的風俗起碼在宋朝就開始流行。宋人楊循吉《除夜雜詠》詩云：「買糖迎灶帝，酌水祀床公」，即指祭祀床神。俗傳床神有男女之分，床婆貪杯，而床公好茶，所以「以酒祀床母，以茶祀床公」，這叫男茶女酒。

少男少女到了十五歲，要在誕生的那張床前舉行成年禮儀，答謝床公床婆的養育之恩，此俗謂之「牽出花園」，與我們目前時興的成年宣誓儀式有異曲同工之妙！父母病故，習慣將床移到廳堂的左側，稱作「搬鋪」。但也有的是待老人壽終正寢後，再將床移到廳堂左側。

總之，閩南和台灣人生生死死都離不開眠床。床，是哺育人們成長的搖籃，是人們親密的生活伴侶。人們生於床上，相愛於床上，最後死於床上。床是人們生活的依附，也是人們的精神寄託。

布拉格瓦茨拉夫廣場 方 元攝

爲自己鼓掌

葉芸竹

每個人都是與衆不同的個體，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環境中盡自己所能去織一張夢的網。雖然有痛苦作伴，但內心總是快樂的。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有人是這樣比喻人生的：每個人都擁有兩個袋子，一個掛在前面，另一個掛在後面，前面的袋子裝着優點，後面的裝着缺點，人們揹着袋子成一字形從人生的起點走向終點，看到的永遠是自己的優點和別人的缺點。兒時的我認爲這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比喻，但對於我們這一代二十一世紀的寵兒來說，自信卻顯得那麼難能可貴。一個又一個大有前途的莘莘學子，在巨大的壓力和不被人理解的壓迫下再也不能自信地面對人生而墜樓自殺。但他們忘記了一個道理——柳暗花明又一村。

世界因爲我們每個人的出現變得多彩，最了解自己的人正是自己，在求得別人欣賞之前，難道我們不應先享受一下自我欣賞的樂趣？

有太多的人太過理智，他們把自己的缺點放在前面的袋子裡，優點放在後面的袋子中，當這群人在排隊前行的時候，看到的是別人的優點和自己的缺點，在對比之下，自己顯得是那麼不堪，自卑也就油然而生。

不公平的比較是可怕的，可以說所有的比較都是不公平的。性格的不同，經歷的不同，基因的不同，造就了成績、習慣、人生觀、世界觀和成敗的不同。比較足以殺人卻不見血，因爲它殺死的是人的心，心死就如同行屍走肉。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優秀的；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自信的；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無憂無慮的；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可以放光的金子。爲自己的夢去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因爲欣賞，才會自信；只有自信，才能笑看人生，從而走向成功的彼岸。

「推遲退休」有人快樂有人愁

蕭 愚

繽紛華夏

勞動者對打工政策總是敏感的。因此，當內地最近人力資源部專家在一個論壇上拋出「有可能將退休年齡從六十歲延至六十五歲」的訊息時，民衆反應極其強烈就成理所當然的事情。

廣州一位經常接觸到各個階層，專事民情調查的人士就感歎，本次民衆熱議的熱情非常高漲，無論是在上班地點，抑或是媒體、論壇，還是在家庭、茶樓酒肆，都可以聽到民衆的議論。他說，政策對各方的震盪非常大，可以用「一石激起千層浪」來形容。

觀察近月來輿論與百姓的反應，總體上看是有褒有貶，「幾家歡樂幾家愁」。各個階層各有各的觀點和理據，從中可窺見目前內地社會各階層的狀況以及利益焦點所在。

現已退休，但仍在廣州一家工廠當看更的何老伯，雖然年齡不足六十五歲，看起來已老態龍鍾，說話都要調動肺氣，提嗓子。他說：「說實話，退休後之所以出來炒更，原因是千把塊錢的退休金不夠花。年紀大了，再做感覺吃力，但畢竟可以多賺點幫補家用。」他接着說：「話又說回來，如無一技之長，去哪裡找活兒？勞務市場裡三圈外三圈都是人，別說要我們去應聘，能擠進去就已不錯了。六十上下不能拿退休金，還要去見工，豈不要命？」

學外貿專業的大四學生小陳說：「不好吧！說是老齡社會來了，但失業問題嚴重，那麼多的老人霸着位，年輕人卻找不到活幹，這樣的社會還有什麼效率可言？」他說，大學畢業，二十四、五還找不到工作，誤了「終生大事」不說，就是進家門也抬不起頭。

現年四十八歲、下崗，要到六十歲才能拿退休金的黃先生，日來無事喜歡到住家附近的花鳥市場看別人做生意，閒逛。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妥不妥，我日盼夜盼盼到六十，假如推遲到六十五，豈不是要多呆五年！」

在會計事務所任職的葉小姐，動了下滑鼠，網上查了一個數字後說：「現在平均壽命是七十二歲，交幾十年的養老金，僅僅爲了七年的生活？」

在某家沒有買社保、不能隨便跳槽，但工資收入又低得可憐的事業單位上班的老趙說：「那眞的要命，要多挨五年！」

收入和工作相對比較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應該說，是「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但也是各有不同看法。公務員林科長回答非常乾脆：「好啊！幹到一百歲也願意，爲什麼不願意呢？」大有康熙帝想「再活五百年」的氣概！公務員有機會升遷，每年還可加薪，反響不一樣可以理解。同樣是公務員的陳女士則意見相左。她說：「我雖然才五十，染髮已幾年了。公務員定崗定編，工作辛苦不是人所知曉。難道要幹到頭髮掉光才能退休不成？」

俄羅斯遊客的簽證

艾 京

東西走廊

在港英政府管治時代，來港的外來遊客以歐美、日韓爲多，而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東歐國家的遊客幾乎等於零，那時即便這些國家來港的船員停泊在香港水域範圍內，除爲了採購急需日常用品以補充船上不足外，一般來說，對這些國家的船員也是諸多限制，根本不准上岸。據說這是當時港英政府基於安全和政治上的理由而採取的一種特別措施。隨着蘇聯解體，大批俄羅斯人湧入香港，其驚人的消費能力令香港人刮目相看。

事實是，從原先的倒爺，到今日的富豪也就這十年間的變化。我認識的葉蓮娜就是從小小的倒爺致富的典型。她第二次來香港旅遊是由我接待的。我在機場舉牌接她時，在閘口足足等了一個小時。她出閘見到我說，在香港入境比進中國要繁瑣得多，關員反覆查她的證件和她所塡的出入境表格。她抱怨說，「同時間到港其他航班外國遊客的入境遠比俄羅斯遊客要快捷得多，唯獨我們比他們要慢三步。」我只能向她這樣解釋：有的國家和地區來的遊客到香港可以落地簽證、免簽證，也有的遊客不是第一次來香港，因此相對而言他們的入境手續要簡便得多。

有些俄羅斯客人搞不清（也可能有些當地旅行社自己也搞不清）到香港與到中國內地都要分別簽證，以爲到了中國內地或到了香港只要簽一次證便可兩地通行無阻。有一次我接待一對俄羅斯夫婦到東莞的虎門參加國際傢具展。他們是乘俄航來香港的，過關時由於只有到中國的簽證，單缺香港簽證而被拒入境。好在香港的邀請單位事先已將我的手機號碼告訴客人，他們從禁區打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後經與關員通話，我說他們只是過境，目的地是東莞，能否通融按過境落地簽證處理。關員很抱歉地說，俄羅斯遊客沒有落地簽證的先例。我只好如實告訴客人，沒有香港簽證就算過境也不能入境。我在電話裡明確告訴這對夫婦，唯有從機場乘船先到深圳，然後再搭其他交通工具到虎門你們所下榻的酒店。當天我便趕到虎門，第二天一早與這對夫婦會合。

俄羅斯遊客因簽證問題引起不愉快的事例雖然不算太多，然而也發生過幾起。娜佳的父親托尼亞是我以前接待過的客人。突然有一天托尼亞從深圳打電話給我說，他二十歲的女兒娜佳要隻身來香港玩一天，他只要求我在火車站接她，並安排酒店，其他就讓娜佳自行安排。娜佳一身輕裝，跟着人字拖走到我跟前，我便送她到酒店，她對我說，她只待一天，晚上她自己回深圳。這是純粹看在友情分上的義務工，我也樂得讓娜佳在香港「自由行」。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八點左右，娜佳打電話說，中國深圳關口不讓入境，理由是，她沒有中國簽證而被打回頭，好在香港方面允許她再次入境。我打電話讓娜佳回到原來的酒店，並答應她第二天陪她到中旅補辦簽證手續。她拿到簽證後便自行到深圳去了。原先遊客可以落地簽證在深圳逗留七十二小時，後來也取消了。

有一次，來自獨聯體中亞某國的阿達耶夫經人介紹，打電話給我說，他在深圳的蛇口，第二天準備到香港玩兩天，讓我接船，他把到港的船次和他的全名告訴了我。第二天我準時到中港城去接這位突如其來的客人。熒光屏顯示他乘的航班已到，按一般情況不用二十分鐘客人該出閘口，但等了半個多小時仍不見他影子。後來我收到從海關打來的電話，讓我進去充當譯員。經關員說，除了聽不懂客人講些什麼外，最主要遊客沒有香港簽證。但我發現客人持的是外交護照，關員不懂俄語，沒注意到另一行英文字，結果阿達耶夫得以通行。《大公報》訪問過俄羅斯在港領館，據說近期港俄兩地的遊客來往入境很快就會實現免簽證，果然如此，那眞該謝天謝地了。